

奔流 中国

変わるメディア

日本経済新聞

背景に

国産不信

300万人が観戦する北京五

という絶好の機会を利用して

華民族の優秀な資源と五千

年の歴史と文化を世界中

めよう。そのために不

が、優れた宣伝活動が

中国共産党中央

(政府)新聞弁公

取材対応マニ

は、五輪に向け

記されている

年)で経済

閉入りを果たし

(88年)で小国の

と称賛、中国も互

しての地位や名譽

「歐米メディアの

になっている」と

欧米メディアは

権や腐敗、環境

面ばかりを強調

が浅く、本質を

意に満ちた誤解

メーソンを悲化さ

日本的亚洲报道与 亚洲外交

〔新加坡〕卓南生

力と

8 テレビ

感んじた。...
産経の5号という安値
に売却されたことを持
家族の関与が取
睡んだ。王曉
半年がかりで



進む

場

NHK 594第1kHz

日本テレビ 4

新聞新

W.A. 世界出版 出版社

見

日本的亚洲报道与 亚洲外交

〔新加坡〕

卓南生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的亚洲报道与亚洲外交/卓南生著. —北京:世界
知识出版社,2008.2

ISBN 978-7-5012-3289-5

I. 日… II. 卓… III. ①国际新闻-新闻报道-概况-
日本②-传播媒介-关系-国家行政机关-研究-日本
IV. G21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4498 号

图字:01-2008-4033 号

本书获日本龙谷大学资助

书 名 日本的亚洲报道与亚洲外交
Riben de Yazhou Baodao yu Yazhou Waijiao

作 者 [新加坡]卓南生 著

责任编辑 罗养毅
封面设计 [日]米山雄基 赵 玥
责任出版 林 琦
责任校对 张 琨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托力科技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20×1020 毫米 1/16 2.6 印张
版次印次 2008 年 9 月第一版 2008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3289-5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我在日本怎样摸索新闻学的道路

“我们总算走上了留日的道路!”

40多年前抵日后不久，在一份留学生刊物上看到了这样的标题，令人感触良深。对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最早的几批亚洲留学生来说，要走上“留日”这条道路，并不是那么容易。

首先，是战争的阴影犹存；其次，是各方对日本学术的评价及留日后的出路，与其说是正面和乐观的，不如说是负面和悲观的。

“到那神风敢死队与宪兵队的故乡，到底能学些什么?”

“日本的一切，充其量只是欧美的仿照。同样是付出宝贵的青春到海外取经，为何不直接前往欧美?”

……

在获悉我决定到日本留学时，几乎周围所有的师辈、亲戚和朋友都异口同声发出反对的声音。

“战后的日本有异于战前，饱受战火洗礼的日本人应该会更加珍惜和平。”

“在亚洲研究亚洲问题，应该更为实用。明治百年以来日本近代化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

“正因为这是一条人们少走的道路，更具有挑战性!”

……

不少与笔者同辈的留学生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踏上了“留日”的道路。不过，坦率地说，出国前师辈和亲朋好友的劝阻，却在笔者和同年代留日同学的心坎上深深地打下了几个问号，并迫使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观察与思考下列问题：

“战后的日本是不是真的有别于战前？”

“日本是怎样看待亚洲的？”

“到日本，到底能学些什么？”

正是抱着力图寻求上述问题真相的视角和态度（日本人所说的“问题意识”），不少与我前后期留日的同学都十分关注日本各个层面的动静与变化，并通过不同形式（信件、聊天或向报刊投稿）向亲友或国人报告他们在日本亲历其境的体验。在有关日本的信息还不那么多的时代里，这些一手的体验记或来自日本的通讯稿，不失为当时人们了解日本的一个渠道。

笔者是学习新闻学的。打从抵日第二年的1967年开始，为了学以致用，便开始为新加坡的两家中文日报《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两报于1983年合并为《南洋·星洲联合早报》，简称《联合早报》）写通讯稿。于是，详阅日本各家大报，便成了我每天的基本作业。1973年，笔者回国出任《星洲日报》社论委员兼研究主任。在此之后的16年间，作为国际时评工作者，阅读日本各家报章，从日本的“窗口”寻求中英文传媒之外的不同信息与日本舆论走向，更成为我工作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便是1989年转入学界之后，日本媒体仍然是我接触与研究的对象。

“日本人是怎样看待亚洲的？”、“日本的大众传媒怎样报道亚洲？”、“日本的亚洲观与亚洲外交的基本论调与特征是什么？”

在过去的40多年里，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日本大众传媒的亚洲报道与亚洲论及日本的亚洲政策走向，遂成了我在撰写评论与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

战前战后有何差异？

正如前面所述，笔者是抱着“在亚洲研究亚洲问题”的殷切

心情与愿望到日本学习的。但坦率而言，这一想法在我抵日后的第一个年头，就已被证明是一厢情愿和行不通的。不论是在大学校园里和同学交谈，还是与左邻右舍的市民对话，笔者都深深感受到日本人对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关心程度之淡薄及知识之贫乏。至于一般知识分子的亚洲观，不是停留于空洞无物的观念论（它具体地体现在当时流行的自由派的学者与学生当中），就是从战前的亚洲论中求灵感。在上世纪50、60年代，由于战争结束不久，那些战争期间为配合“大东亚圣战”而出版的刊物在旧书店还堆积如山。在东京神保町的旧书店街，日币20元、50元的书比比皆是（当时一美元可兑换360日元）。

翻翻上世纪30、40年代的出版物，再看看当时日本论坛上某些亚洲问题专家、学者的言论，不少亚洲青年不能不惊叹两者的论调和思维之相似。20世纪60年代日本财界一度甚嚣尘上的“马六甲生命线论”是一个例子；某些专家把“战后的印度尼西亚”比喻为“战前的满蒙（满洲和蒙古）”，大谈“印度尼西亚是日本的生命线”是另一佳例。

不仅如此，为了协助官方与财界制止上世纪60、70年代东南亚的“反日”浪潮和改善日本的形象，日本的新老“东南亚通”们更倾巢而出，出谋献策。特别是在1972年，在泰国学生由于不满日本经济势力的长驱直入和不把泰人看在眼里，而发动了为期十天的抵制日货运动之后，日本的大众传媒与大批的专家、学者都被动员到当地“考察”和“调查”。1974年1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东南亚时遭遇泰国和印尼学生的游行抗议和暴动事件，上述报人、专家与学者更是急于开列各种旨在缓和双方矛盾的“药方”。^① 如果将这些“东南亚通”与战前和战争期间

^① 有关这一时期日本舆论界的动向，参看拙稿《日本的亚洲研究热——日本人为什么令人讨厌？》和《日本人为什么不受欢迎？——且听日本专家的新论调》，收录于《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全三卷）——《日本社会》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245—256页和第56—69页。

自序

的“南洋通”或“宣抚官”^①相比，不难发现两者有其共同之处：他们与其说是在认真检讨日本南进国策之是否失误，不如说是旨在通过“文化力量”等手段达到“感化”对方的目的。战后的“文化交流论”与战前旨在掌握人心的糖衣炮弹——“文化工作论”最大的区别究竟何在？这不能不令人感到迷惑不解。

至于在日常生活中，常有人向我们提出下列问题：“新加坡人是不是也吃大米？”或者“你们对日本有何期待？”（典型的小国对大国的“期待论”）……这些提问既流露出日本人对亚洲的无知及潜在的优越感，也间接宣判了我们渴求的“在亚洲研究亚洲问题”，其实是一厢情愿的美梦。

在研习新闻学的过程中，笔者也曾想过寻找一个有关日本与亚洲的研究题目来探讨，但认真翻阅前人的研究书刊目录，几乎找不到一篇相近的研究论文。日本的新闻传播学者是不是真的都与亚洲毫无交往而对亚洲毫不关心呢？我曾经存有这样的疑问。不过，在翻阅师辈们的著作与战前的记录及经历过诸多“文化震撼”之后，笔者得出如下的结论：日本的专家学者之所以与亚洲人难以坦诚沟通，仅仅归因于战后日本报界、学界的“脱亚”心态及他们对欧美文化的推崇，并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

原来在当时学界与报界的圈子里，有不少知名的新闻学者和新闻工作者是与“亚洲”有着深厚的渊源的。对于其中的某些人来说，“亚洲”简直是他们的事业与人生生涯中永不能磨灭与遗忘的重要部分。在抵达东京向日本新闻学界取经的第一、二个年头，笔者就遇到了这么一位与“亚洲”密不可分，而令我迄今仍难以忘怀的人物……

^① 日本在占领亚洲各地之后，为了促使当地民众“理解”日本和稳定人心，曾派遣大量从事“文化活动”的宣传班人员，他们统称为“宣抚官”。其中“从军宣抚官”的主要任务是发布“对敌宣言”、“归来（指投降）劝告”、“收集情报”、“削减抗日（相关）的物件（指书刊、标语等）”、“展示亲日物件”等。“定点（驻扎当地的）宣抚官”则从事于“救济难民”、“奖励推行日本语的普及活动”、“发行报纸”、“主办演出、展览”等。其目的是“安定民心”。详情参看[日]青江舜二郎：《大日本军宣抚官——一个（青年）青春的纪录》，芙蓉书房，1970年，第190—191页。

东京拜师的文化冲击

那年笔者从新加坡转到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新闻学系，成为二年级的插班生时，就和日本的同学们一同选修了一门据说是非常著名的新闻工作者酒井寅吉老师的课——《现代新闻事业论》。这位老师究竟著名在哪里，当时日语还似懂不懂的我不很清楚，只知道他曾经是《朝日新闻》的大牌记者及在新闻传播学界颇有名气的《综合新闻事业》季刊当主编。

上完第一堂课，我和酒井先生打了个招呼。先生听说我是来自新加坡的留学生，似乎感到有些突兀。他愣了一阵，然后恭恭敬敬地向我鞠了一个躬，说了声“对不起！”，即悄然离开课堂。

我一时转不过来，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往后仔细打听，才知道他是当年新加坡沦陷时，亲自目睹并报道了有“马来之虎”之称的山下奉文将军劝降英国白思华将军、迫使后者在“**Yes**”与“**No**”之间作一抉择的会谈而驰名天下的《朝日新闻》“从军记者”（即随军记者）。他曾在《大阪朝日新闻》夕刊连载长达33篇的《马来战记》，并“以其美丽的文笔博得百万读者的喝彩”。酒井在回返日本之后还四处演说，介绍东南亚人对日军热烈的欢迎情景，成了当时报界的红人与“演说记者”。

不难想象，作为“大东亚圣战”的随军记者，酒井先生当时所写的“战记”报道及其“演说”有着怎样的内容。问题是，在战后，作为一名自称颇有“反骨（造反）精神”的新闻工作者并被卷入“横滨事件”^①的酒井，到底怎样看待自己战争时期的战地报道，及如何总结与评价其“从军记者”的作用与影响？很遗憾的是，在整整一个学期《现代新闻事业论》的授课中，我听不到任何这方面的话题。

笔者是在1942年4月，也就是日军于同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一）攻陷新加坡并将之易名为“昭南岛”的两个月后诞

^① 横滨事件是指日本情报部门于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国内进行言论思想镇压而制造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当时共有60余名知识分子因涉嫌“参与共产主义活动”或具有支持败北主义的倾向等罪名被捕入狱，著名的中央公论社和改造社等也被情报局命令解散。

自序

生的。对于日军占领下三年零八个月的恐怖日子，我虽未留下什么记忆，但孩提时从亲历其境的长辈的谈话中，从小学时期同班同学丧失父兄、亲人的具体例子里，可以肯定日军的南侵行为与“大检证”^①的屠杀事实是铁证如山的。在日军侵占新加坡时担任“从军记者”，高举《朝日新闻》报旗冲入新加坡的樟宜监牢，比日本侵略军还抢先一步“解放”被关于监牢的日本人的酒井先生，当时是怎样记载这段史实的，他在战后又是如何总结这段历史的呢？在战后的大学讲坛上教授《现代新闻事业论》，强调要“客观报道”与传达真相的新闻学者，其内心的真正看法是什么？我是非常感兴趣的。

有一天，笔者在神田的旧书店看到了酒井先生战后写的《马来战线从军的回忆——抓住“轰动世界的特种类（新闻）”的昭南事件的记者》的回忆录。^② 阅毕不禁震惊不已。原因是口口声声强调“客观报道”与传达真相的新闻学老师，在战争结束已逾十余年的50年代末期，对于自己美化战争的旧著《马来战记》，居然还持以“同样的心情”。他写道：“我并不存在着诸如对战争的‘罪恶感’之类的心理压力。”

从酒井先生的上述看法，以及他战后一字不提“新加坡大检证”事件，但却缅怀其《马来战记》中歌颂亚洲人认同“相同肤色”的日本兵并视之为弟兄的内容这一态度，不难看出战后的酒井先生对“大东亚战争”的基本态度依然停留在战前和战争期间。

对此，笔者当时受到的“文化震撼”是巨大的。我曾想进一步了解当时的情况并与老师论理，但据说他已离开世间。酒井先生在课堂上遇到一个在他作为“从军记者”红得发紫的顶峰时期

^① 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机开始轰炸新加坡，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从2月18日起一连三天，日本占领军在新加坡全岛展开“大肃清”的活动。由于当时凡被审问而获释者皆被盖上“检证”二字，新加坡人称此恐怖的大逮捕活动为“大检证”。据1942年版《朝日东亚年报》之记录，当时共有“70699人被逮捕”。由于当时被逮捕后死里逃生者少有所闻，估计死者不下五万人。详情参看[新]许云樵、[新]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 1937—1945》，文史出版社，1984年。

^② 见日本《丸》，1959年2月号，第30—32页。

诞生的受害国青年，到底持以什么心态？他见到我时，为何要鞠个躬并说声“对不起”，对我来说，迄今仍然是一个谜。

如果说，酒井先生这名前“从军记者”是我留日期间最早接触的、与亚洲关系密切的新闻学者的话，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与70年代初期我所接触的著名新闻学者当中，与“亚洲”和“战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老师，尚有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殿木圭一教授和战前任职于东京帝国大学新闻研究室（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前身）、战后在立教大学任教的小山荣三教授。殿木教授在战争期间曾被日本同盟通信社（日本共同社的前身）派往马来半岛，小山教授在战争期间则曾著有《战时宣传论》，是积极主张加强对亚洲占领地展开“宣传和言论对策”工作的著名新闻学者。殿木先生对留学生非常亲切。我曾表示要研究有关日本占领新加坡与马来半岛时期的新闻史，他说那得去打听是否有足够的资料。一个星期后，殿木老师告诉我这方面的资料已不存在，建议我换个研究题目。在谈及他在马来半岛的经历时，殿木老师谈的都是一些轻松的话题。从他口中，我从未听到有关日军统治马来半岛的真相及日军当时的新闻方针和政策，有的只是日常生活的趣闻。

在立教大学的研究生院上博士课时，修小山荣三教授必修课的学生只有我一个人，这些课大都是在大学附近的“吃茶店”（日式咖啡店）上的。我曾多次表示想了解战前日本思想界和舆论界的状态及他对其战前著作的看法，但都被引到其他“开朗”的话题并提前下课。

从殿木教授和小山教授的反应中，我知道，要从与战前的“亚洲”及“战争”关系颇深的日本新闻学者口中获得相关的信息，是不可能的。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政治土壤与气候，战前、战时日本“从军记者”、“报道员”的“战记”及当时新闻理论家们的舆论宣传活动和理论，在战后也原封不动，而未受到应有的反思和“检证”（验证）。

这样的情况当然不仅仅发生在殿木和小山身上。就我所知，在战后的日本新闻传播学界，不少颇有名气的学者也有着类似的

情况。其中包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第二任所长千叶雄次郎教授和庆应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米山桂三教授。千叶教授在战争期间是《朝日新闻》东京本社編集局次长兼（南方）前线局长，曾到“南方”巡视，并主张对“南方”加强“文化工作”。米山教授在战争期间与前述的小山荣三齐名，著有《思想斗争和宣传》等旨在加强日本的舆论宣传活动的著作。^①他们在战后日本新闻传播学界各占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并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在他们战后的新闻学术研究活动中，对于其战前、战时的活动，同样都一字不提而留下“空白”。

由此可见，日本战后的新闻界与新闻学界和战前似乎没有“连续性”，但实际上却是有“连续性”的。

战后的“脱亚论”与“兴亚论”

当然，对于战前与自己结下不解之缘的“亚洲”与“战争”，战后一直保持沉默，俨然摆出与自己毫不相关姿态的，并不仅是前述知名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者。认真而言，他们只是战后日本文化界的一个缩影罢了。笔者作为来自赤道、一度被改名为“昭南岛”的新加坡的青年，对于诸如战争期间被当局征用为“南方文化人”的诗人神保光太郎、著名作家井伏鱒二等人抵达新加坡后，究竟从事了什么样的“文化活动”，他们战后又对自己的这些“文化活动”如何总结和评价等问题，当时是十分关心的。笔者也曾和他们当中的个别人士接触，但有关的真实情况皆未得要领。

尤其令笔者感到惊讶的是，上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曾积极从事日中邦交正常化活动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中岛健藏，在战争期间也曾被征用至新加坡，但他对这段往事同样采取回避的态度。原来，中岛是当时“日语普及运动宣言”的起草者。该宣言的目的在于向“天皇陛下（统治）的新赤胆之心”的“马来及苏门达腊的岛民”，提倡学习“正确而美丽的日

^① [日] 生田正辉：《米山桂三博士还历纪念论文集 日本社会与近代化》，庆应通信，1967年，第593页。

本语”。

中岛在当时起草有关宣言，也许有其难言之隐。但在战后，特别是像他这样一位以“自由开明派”姿态出现、积极从事日中友好运动的知识分子，对这段历史显然是有交代清楚和予以总结的必要。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正如一名长期从事日本与亚洲交流活动的日本朋友所指出一般，中岛对此黑暗时代的真相并未留下应该留下的记录。^①

正因为战后的日本对战前日本的亚洲报道与亚洲论从未进行过彻底的反思，从亚洲人的角度来看战后日本知识界的相关言论，便有时难免有格格不入之感。

这样的情况并不仅限于某些认同战前“解放亚洲战争观”的“兴亚论”的保守论客。正如前面所述一般，即使是战后以“自由派”姿态出现的诸多亚洲问题专家与新闻工作者，其言论也有不少令亚洲人感到隔靴搔痒，或者与亚洲的现实社会脱钩之处。他们言行的最大要害是过于概念化。

认真分析，当时的日本人一般对亚洲并不了解，也不关心，即使是当年热火朝天，积极参加反战运动，天天游行反对越南战争的日本大学生也不例外。因为，尽管他们每天在高喊反对越南战争的口号，但归根结底，只是将之视为一个抽象的运动口号罢了。越南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当时东南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情况如何？这些似乎并不是他们的关心所在。

针对战后日本人的东南亚观，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参与发起“越平联”（全称为“让越南和平！市民联合起来！”）市民反战运动的鹤见良行^②先生在其著作中曾有如下十分形象的分析：

日本人在眺望东南亚时，几乎毫不例外的都戴着眼镜。

① [日] 田中宏：《中岛健藏氏的〈我的中国〉读后感》，《中日新闻》夕刊，1973年3月3日。

② 有关鹤见良行与“越平联”的活动与评价，参看拙稿：《为何调查？为谁研究？——怀念一位对东南亚有真挚情谊的日本知识分子》，收录于拙著：《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全三卷）——《日本社会》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204—207页。

眼镜有二：其一是国家；其二是阶级。日本人戴着的眼睛，不是前者，就是后者……保守派戴着国家的眼睛，而革新派则戴着阶级的眼镜窥探东南亚。

由此可见，不少自由开明派知识分子的东南亚观，其实是非常观念化，或者说停留于抽象的意识形态的。至于保守派专家的东南亚观，有不少仍然还无法摆脱战前为“大东亚共荣圈”服务的“南方书”的影响（其中有些人甚至是无时无刻不在从“南方书”中找灵感）。

除此之外，在战后日本良心派的知识分子当中，还曾经一度流行着如下的看法：“出自对亚洲人民的罪恶感，除非有特别的理由，日本人无法轻易前往亚洲乃至冲绳……”

对于年长一辈，特别是直接或间接参与那场战争的老一辈日本人来说，他们存有如此复杂的心理和感情是可以理解的。可令人费解的是，自称为“自由开明派”的年轻知识分子也以此为理由而力图避开亚洲的话题和现实的亚洲。其结果是，保守派的日本知识分子（出自国策的需要）对亚洲各地的“考察”、“调查”越来越频繁和越来越起劲，而开明派或革新派的日本专家和学者实际上成了远离亚洲的“脱亚论”的实践者，或者虚有同情亚洲的口号而对现实的亚洲保持距离的观念论者。

然而，不管是认同战前“脱亚论”或“兴亚论”的保守派，或者是在实际上执行“脱亚论”精神的观念论者开明派，他们的言行只带来一个结果，那就是促使日本与亚洲的关系“既近又远”。

正因为如此，对于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日本媒体充斥着“亚洲”的关键词和主张“脱美（欧）入亚”、定义不明的所谓“亚洲主义”论调，笔者存有疑虑而无法举起双手支持。说得清楚些，在笔者看来，“亚洲人最怕的就是听到倡自东京的形形色色的‘亚洲主义’”。^①

^① [新] 卓南生：《发自东京，令人生畏的亚洲主义》，《每日新闻》，1995年1月11日。中文版见《“亚细亚主义”为何令人生畏》，收录于拙著：《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全三卷）——《日本社会》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467—469页。

现代“藤野先生”的苦恼

在笔者7年多的留日期间里，针对日本的亚洲报道问题，能毫不保留告诉笔者真相，并对笔者往后的评论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老師，该推立教大学的影山三郎教授。

影山先生出身于新闻界，曾任《朝日新闻》社论委员。他当时是立教大学的兼职老师（后来成为专职教授），但他上课时认真之态度及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远非其他专职教授所能比。影山老师不仅仔细批改我们的论文，还常邀我们到他家长谈到深夜。有一次，当老师和师母知道我们亚洲留学生在日本租房子常遭到白眼与拒绝时，他们甚至有过将其家的小庭子改建为留学生宿舍的念头，但被我们劝阻。我们不少留学生都为之感动而称影山老师为现代的“藤野先生”。

在笔者所接触的诸多日本师长当中，影山教授是少有的一位对战争问题采取不回避态度，肯正面具体回答年轻人提问的老师。1970年11月，当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以死谏国”切腹自杀的消息^①传到我们课堂时，校园里的气氛显得异常阴沉。当天，影山教授以极其沉重的心情，冷静地向我们介绍了战前日本的政治空气以及战后以来日本舆论界诸多触之不得的“敏感问题”的来龙去脉。他还深刻地分析了这些动向所隐藏着的深一层意义。当天的课整整延长了两个小时。影山先生当时为我们揭开日本战前与战后舆论界“黑手”的连续性，迄今仍然深刻地留在笔者的脑海中。

针对战后日本舆论界的走向，影山教授在这之后曾在其连载于《大众传播市民》的系列文章中有进一步的说明。

在一篇题为《逆时针转》的文章中，影山先生对日本一部分新闻学者和新闻工作者的一些似是而非之新闻观提出了尖刻的批评。

原来在日俄战争前夕，日本舆论界曾有过主张和平的“非战

^① 详情参见拙稿：《震撼日本的三岛切腹事件》，收录于拙著：《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全三卷）——《日本社会》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240—244页。

自序

论”；同样地，在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报刊也曾有“战争回避论”的主张，但一旦战争开始，哪怕是对“满洲事变（指九一八事件）内心存有质疑者”，都齐步跑到参与战争行列的最前线，“在其报纸的版面上，倾其全力主张动员全民展开扫荡战……”

对此，曾有新闻工作者著书宣扬如下论调：“对于（新闻工作者）内心到底在想什么这个问题，其实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思考的必要。”

针对如此这般的言论，影山教授表示不能同意。恰恰相反，他认为新闻工作者对于这样的现象应引以为戒，不能重蹈覆辙。他指出新闻工作者对当时日本舆论界“逆时针方向转”的动向应该予以批判。影山老师理直气壮的批判是有说服力的。

不过，坦率而言，要和影山老师那一代与“战争”和“亚洲”问题有直接经历的人坦率探讨有关问题，有时难免会出现情绪失控的时刻。记得有一回，一位同学单刀直入地问道：“老师，你当时为何不反抗？”对此，影山先生一面耐心地向我们细述军国主义时代专制统治者的黑暗与残暴，一面也对当时无法阻止军国势力之膨胀而感到悔恨。他越谈越激动，声调也越提越高；他不止一次提高嗓音表示，每每谈起这些往事，他都感到十分难受，甚至想要自尽。

也许是担心我们师生激烈的讨论和争议会闹出问题，影山夫人每每私下暗示同学们转换话题。

正是出自对战前无法阻止军国日本发动战争的悔恨，影山先生对于战后日本的“逆时针转”，特别是日本舆论界这方面的动向，无时无刻不敲响警钟。不过，从他晚年对日本政局与舆论界走向的言谈中，不难观察到他是十分悲观与孤寂的。据影山夫人反映，影山老师晚年的口头禅是：“看来日本得再打一场败战，才能与亚洲建立起真正友好的关系。”一位热爱和平，对战前日本深刻反思，充满悔恨的知识分子，到了晚年却说出了对其祖国如此无奈的话，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日本的悲哀。影山先生的苦恼，可以说是他同年代有良知的日本知识分子的共同苦恼。

由于战后日本的“亚洲热”是在对战前的“亚洲热”并未

真正反思的背景下重新掀起的一股热潮，影山先生及其同辈对此不能不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1970年代初，《朝日新闻》为了配合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策，正在筹办出版一份以高层知识分子为对象的名为《朝日评论》的季刊。记得当时已经退休的影山老师曾为是否要应报社的邀请而肩负起这份以亚洲问题为中心的刊物的副总编辑重任而苦恼。几经犹豫和多方考虑后，他终于承担了有关职务。这足见，对于影山先生及其同辈有良知的日本学者和新闻工作者来说，“亚洲问题”的确是一个既不轻松，也不容易应对的难题。

以上所述的是笔者最初到日本留学，摸索新闻学道路的一段历程。从中不难发现，“日本与亚洲”和“日本的亚洲报道”是笔者抵日后始终不能不关心的重要题目。留日时代是如此，1973年返回新加坡担任华文报社论委员、专职从事时事评论工作时也是如此。

1989年笔者转入学界，配合教学和研究的需要，笔者不断将个人对日本与亚洲问题的观察、日本与亚洲各国相互报道之差距、日本传媒的亚洲论调与亚洲外交等的研究陆续整理成文发表。收集在本书的，正是这些在不同年代撰写的论文集。如果书中诸多不成熟的观点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笔者的心愿就已达到。

〈补记〉

本文原为拙著日本版《日本的亚洲报道与亚洲论》（《日本のアジア報道とアジア論》，日本評論社，2003年）的自序。

本书（中文版）收录了日文版第一部分“日本的亚洲观与报道”的序章至第七章，并补以数篇有关“从亚洲看日本的变与不变”的论文。同时附录了数篇相关内容的座谈会记录及拙著《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全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出版后撰写的有关时评（即“从安倍政权的开场与闭幕至福田内阁的诞生”）。

总论：日本的亚洲报道往何处去？

一、“传媒大国”与“金太郎糖”

日本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传媒大国”。看一下其数目不菲的报纸发行量及电视普及率，相信谁也不会否认这个事实。

然而，与此同时，日本大众传媒的报道、评论的模式和态度，特别是各媒体之间在激烈竞争中所引发的各种热潮，或者为了掀起这些热潮而不惜牺牲在正常情况下本应该报道的新闻的做法，不能不令我们感到吃惊。于是我们就会产生如下疑问：何为客观报道？何为平衡报道？日本的大众传媒能否正确传达世界（特别是亚洲）的真相？

有关日本大众传媒对亚洲的报道，基本上存在着两个层次的问题。其一是和日本传媒所具有的特质分不开的。也就是说，亚洲报道是日本大众传媒的一个构成部分，因此日本媒体报道所具有的特征和倾向也就会自然地反映在亚洲报道里。在这一点上，亚洲报道的问题可以说是日本大众传媒报道问题的一个缩影。其二是战后日本大众传媒的亚洲报道所特有的问题，这个问题既关系到日本传媒将亚洲报道置于何等位置，也与大众媒体对亚洲的视点有关。